

田龙过◎著

# 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及 问题域转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田龙过 ● 著

# 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及 问题域转换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及问题域转换研究 / 田龙过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5161 - 0960 - 1

I. ①后… II. ①田… III. ①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西方国家 IV. ①I109.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4711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郭晓鸿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1000 ·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绪 论

“文学是什么?”这是传统文学理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文艺学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逻辑展开。因此,如何提问,提什么问题,是文艺学研究的首要问题。

传统的文学提问建立在哲学提问范式基础上,哲学提问方式的每一次转向,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文学提问方式的变化。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存在问题提问的历史,不同的提问方式及其回答方式构成了不同的哲学流派,推动着哲学的元问题探讨不断深入。哲学上的第一次提问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它提问的形式是“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域,有什么样的问题域才可呈现什么样的问题。这种提问方式预设了提问对象的存在,即现象、经验背后支配和决定现象和经验的超验本体,它是世界存在的本原、根据和基础,而回答问题的方式则是以抽象的逻辑范畴推演的方式或者以追求普遍本质的方式,试图为现象或经验世界的统一性提供先验的基础。这种本体论的哲学提问方式建立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基础上,它成为自古希腊到黑格尔以来西方哲学提问的基本认知图式。到了笛卡尔那里,哲学提问方式的基本架构没有变化,但提问的前提和提问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笛卡尔开始质疑传统本体论的逻辑推演方式,他将不能怀疑的“我思”作为提问

的预设前提，质疑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开创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毫无疑问，主体论哲学虽然转换了提问对象，扩展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域，但提问的基本架构仍然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这种思维框架之中。但是人们又有了新的疑问，“我思”的“思”是以什么来体现，作为思维工具的语言是否能真正地表达思维本身和思维的对象，作为认知的主体，它能否通过语言接近客观世界，因此，传统哲学的问题域又从此转向了语言。同时，把认识可能的条件建立在统摄主体性的理性基础上，理性是否可靠，这又是人们的一个疑问。可以说，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在不断地转向，但每一次转向不管它的出发点为何，方式方法怎样不同，其目的都是一个，就是对古希腊哲学提出的基本问题的不同路径的再一次提问。

哲学提问方式的每一次转变，都影响着文学提问方式的改变，也促使文学研究的问题域随之改变。对“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无疑将文学研究建立在探寻文学形而上的、本质性的因素之上。但是，这种提问方式暗含了两个假设：其一，“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无疑预设了文学存在这一前提，在文学存在的前提下，试图找出一种涵盖所有文学的共同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通过这些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反过来定义文学本身。因此，“文学”作为一种存在物已被先验地假定，并从这先验的假定物出发去寻找文学的本质性特点。其二，文学是什么其实就是给文学下定义，而下定义就是从“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中发展出来的。一般而言，定义的方法就是把被提问的对象联系到这个对象所属的类概念上去，它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逻辑方法。“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又无疑假定了文学具有一定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的本质，并且这种本质在对文学进行界定之前已经先验地存在。文学提问方式虽然追随着哲学提问方式的变化再改变，但总的提问方式和框架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余年间，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可以说浓缩了西方几千年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它使中国文学理论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体系化的建

设,形成了较有特色的中国文艺学理论体系,但毋庸置疑的是,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作为一种深层的认知模式一直左右着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发展思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理论进入中国文学理论界,文艺理论界开始对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提出质疑和反思。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是一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特征的、非历史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它严重地束缚了文艺学研究的自我反思能力与知识创新能力,使之无法随着文艺活动的具体时空语境的变化来更新自己,导致了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以及大众实际文化活动、文艺实践、审美活动之间曾经拥有的积极而活跃的联系正在丧失,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将文学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网络之中加以研究,使文学理论知识非本质化、历史化和地方化。

本书认为,用后现代理论反思中国文艺学的传统提问方式,对拓展文学的提问方式及问题域无疑具有建设性意义。但是,将后现代理论简化为本质主义,并认为反本质主义思维模式是中国文艺学走出危机的出路,这不但是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和对西方后现代理论精神的误解,也是对目前中国文艺学存在问题的误诊。因此,深入探讨和研究西方后现代理论的思维方式,为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益的“他者”思维模式,将是本书的重点。

那么,后现代理论是否就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理论?前面说过,人类对世界的思考从“存在”、“意识”和“语言”三个层面逻辑演进,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类如何认识,人类如何表达这种认识,对这三个层面认知的反思促成了哲学的发展。统治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认为,存在是事物或者世界的本原和根据,但一直被现象所蒙蔽,它以语言的形式将具体和个别转变为普遍和共相。后现代理论认为,固定的、先在的本质特征是一个虚假的预设,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相信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一个深藏着的唯一的本质,相信本质和现象的区分提供了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

概念图式，这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后现代理论认为，传统哲学以同一性为基础，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归为同一性，其结果是同一性吞噬了个别性，总体压制了个体化，导致传统哲学成为一种总体化、极权化的理论模式，形成了现象/本质、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形成了不平等的等级结构。这种对世界本源的形而上学解释是一种宏大叙事，是一种统治哲学，是虚幻的、不可靠的。后现代理论反对这种一元的、单向的思维模式，提倡多元的、多维度的思维。从笛卡尔开始将理性的“我思”作为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建立起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后现代理论认为，将理性作为我思的前提，同样是不可靠的，主体只能是从属的、有条件的、时间性的，它并不能控制客体世界，它只能出现在话语结构中，主体或自我只是一个在语言中的处境，一个话语的效果，这种预设前提下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给先验的主体无穷的权利，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体现，它不但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语言同样并不是传统哲学所认为的那样，与思维、事物呈现一一对应的直接关系，符号的意义也不是来自于存在等本源性依据，而是一种差异化产物，是符号间无止境游戏的产物，不存在先验的所指，凡是所指都是能指，不存在最终的、确切的意义，真理只是一种语言效果。为了取代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后现代理论强调要用关系论取代实体论，强调从“差异性”、“互动性”和“创生性”的视角提问。如德里达从语言的角度来追踪形而上学的根基，福柯把无所不在的权力结构作为知识产生的根据，德勒兹哲学推崇创造、生成、流动的“游牧思想”，他的所谓横向的、“根状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动态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利奥塔通过多种异质性语言间的游戏说明知识实际上是生成性的获得过程。后现代的出场不但使我们对传统的哲学、社会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文学提问方式和问题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书认为，后现代理论只是西方几千年来哲学探讨方式或者研究范式的一种变革，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唯一的、正确研究路径，它只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之外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后现代理论

给我们最大的财产就是质疑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但质疑并不是推翻，而是为了寻找更好的立足点。

后现代理论对文艺学的反思是从对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开始的。后现代理论认为，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是一致的，其本体论或者认识论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或者本质主义。传统理论对文学的反思始终围绕着“文学”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前提，即“文学”成为文学的可能条件，不管它们是从哲学层面还是社会学层面，文学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它们思考的根本。而后现代理论区别传统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们对传统反思的反思，即对传统的文学提问方式的反思。对提问方式的反思是一种对提问前提的反思而非提问结果的反思，即后现代理论不再关注“文学是什么”，而是关注“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本身及其后面的理论预设。后现代理论在“解构”传统文学提问方式的理论预设之后，为我们提供了不同视角、不同路径的文学提问方式，如德里达、福柯、布迪厄以及伊格尔顿、詹姆逊，他们避免了本质主义的文学提问，分别从权力、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角度重新审视文学这一问题，让我们看到了文学提问方式的多种可能性。

每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基础上，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理论预设，这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使在标榜要“摧毁”一切的后现代理论也不例外，一个理论体系是否能站得住脚，就看其理论预设是否成立、是否可靠；反之，要推翻一个理论体系，那也得从其理论预设入手，同时还必须看其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性、可靠性。传统哲学的问题回答过程或者论证过程建立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础上，而这两种逻辑又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即作为理论的论证工具，也是建立在假定的前提上。因此，理论反思一般都是将矛头直指理论体系的预设前提而不是其结果，这个前提就包括了立论的前提和论证的前提。后现代理论对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的质疑和反思也是从传统文学提问方式的理论预设和回答方式入手，通过对传统文学提问方式的解构，开拓文学提问方式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本

书在对后现代理论的分析时，也将采取后现代理论的方法和策略，将后现代理论已有的结论悬置起来，放进括号，重新审视和质疑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通过对后现代理论的“解构”，本书认为，文学本质的追问只是在后现代理论视阈中失去了合理性，但并没有失去其合法性。因为如果非本质主义一家独大，成为文学的提问方式，那岂不又成了一种极权主义，这不符合后现代理论提倡的多元化、差异化的原则。国内学界对后现代理论的极端误解使激进主义者将本质主义视为落后的、必将弃之的文学提问方式，而保守主义者则担心后现代主义只是解构而不建构，会导致文学理论的消亡。其实，后现代理论只是提供了另一种多元化的提问文学的方式，提供了我们如何看待文学的另一种路径。

中国文艺学借鉴西方后现代理论，必须对后现代理论进行解构，悬置其结论，继承其批判精神和多元化的提问方式。不要“照着说”和“接着说”，而是要学会“自己说”。所谓“自己说”就必须敢于质疑权威，善于发现问题并重新设置自己的问题，在问题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基本精神，本书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前提，转换提问方式是中国文艺学发展新的立足点，文学论域的扩展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关键所在。中国文艺学应该借鉴西方后现代理论，从现实出发，通过多种方式、多个路径、多个层面对文学进行提问，全面考察和审视文学存在和文学活动，从而绘制出完整的中国文学理论地图。

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着重探讨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和这种提问方式的预设前提和理论基础。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逻辑展开是从文学定义开始，要下定义就必须明确文学的本质，但是，对本质的探寻只能通过形而上学的追问方式实现，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总是探讨事物是什么，而现实中我们只知道事物怎么样，因此，本章将分析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追问方法的悖论所在。

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到

底是什么关系，第二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文学意识形态本质论的接受史，梳理了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流变历程，并对文学本质的意识形态界定的前提条件提出质疑和反思。本书认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意识形态并非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既有意识形态性，也有反意识形态性。

第三章是对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的变革及其问题域转换的专题研究，着重分析了德里达、福柯、布迪厄和鲍德里亚等后现代理论家的文学提问方式的后现代转换路径。本章将剖析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以及他如何对文学进行提问，剖析福柯文学提问的话语视界及其隐含着的复杂权力关系，分析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其文学生成逻辑。鲍德里亚超美学的提出前提条件是什么，米勒提出的文学终结论的意义何在，它对文学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域有哪些拓展，也是本章分析的一个重点。本书认为德里达、福柯和布迪厄不同程度地放弃了本质主义的文学提问方式，他们认为文学并非具有某种先验的、固定的本质，而是一种渗透着权力、利益或者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建构物。他们多种路径的文学提问方式，为绘制完整的文学地图提供了多种有意义的尝试。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文学意识形态复兴的研究一直是后现代社会中此起彼伏的文化现象，第四章对后现代理论中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这一问题的存在前提提出质疑。本书认为，后现代理论虽然宣布意识形态终结，但其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看法，其文学提问中仍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阴影。本章以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视界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们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合理地吸收后现代理论的有益成分，对文学问题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提问和回答。本书认为，伊格尔顿和詹姆逊将文学纳入政治视界，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入手进行文学提问，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思路。

本书第五章即结尾部分，提出了西方后现代理论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启

示，其中包括批判精神的继承，批判方法的借鉴，提问视阈的拓展等。本书认为，文学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提问的争论只是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并不能解决中国文艺学的根本问题，中国文艺学应该借鉴西方后现代理论，从现实出发，通过多种方式、多个路径、多个层面对文学进行提问，全面考察和审视文学存在和文学活动，从而绘制出完整的中国文学理论地图。

# 目 录

|                                  |         |
|----------------------------------|---------|
| 绪论 .....                         | ( 1 )   |
| 第一章 传统文学研究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域的反思 .....     | ( 1 )   |
| 第一节 传统文学提问方式及其内在悖论 .....         | ( 1 )   |
|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及文艺学提问方式的新趋向 .....   | ( 13 )  |
| 第二章 现代性视阈中的文学意识形态考察 .....        | ( 25 )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文艺学体系的建立 .....     | ( 25 )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谱系考察 .....          | ( 36 )  |
|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文学与意识形态 .....     | ( 63 )  |
| 第三章 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的变革及其问题域的转换 .....   | ( 80 )  |
| 第一节 后现代理论的中国出场 .....             | ( 80 )  |
| 第二节 文本之外无他物——德里达后现代文学观考察 .....   | ( 88 )  |
| 第三节 权力话语中的文学提问——福柯后现代文学观考察 ..... | ( 99 )  |
| 第四节 文学场的炼金术——布迪厄的文学观 .....       | ( 109 ) |
| 第五节 从符号到拟像——鲍德里亚后现代文学观剖析 .....   | ( 116 ) |

---

|                                             |              |
|---------------------------------------------|--------------|
| 第六节 “米勒”作为一个问题的意义 .....                     | (131)        |
| <b>第四章 后现代视阈中的文学意识形态终结与回归 .....</b>         | <b>(135)</b>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终结理论的前提及其质疑 .....                   | (135)        |
| 第二节 后现代理论视阈中的文学“意识形态性” .....                | (158)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视阈中的文学提问——伊格尔顿文学提问方式<br>后现代转换 ..... | (164)        |
| 第四节 从辩证批评到认知绘图——詹姆逊文学提问方式考察 .....           | (203)        |
| <b>第五章 后现代文学提问方式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意义 .....</b>       | <b>(239)</b> |
| 第一节 “解放”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前提 .....                   | (240)        |
| 第二节 转换提问方式是中国文艺学发展新的立足点 .....               | (249)        |
| 第三节 文学论域的扩展是中国文艺学建设的关键 .....                | (257)        |
| <b>参考文献 .....</b>                           | <b>(263)</b> |
| <b>后记 .....</b>                             | <b>(277)</b> |

# 第一章 传统文学研究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域的反思

## 第一节 传统文学提问方式及其内在悖论

—

“文学是什么？”这是传统文学理论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文学研究随之展开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建立在“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之上的。有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域，有什么样的问题域才可呈现什么样的问题。对“文学是什么”的提问，无疑是将文学研究建立在形而上的、本质性因素追问的基础上，但是，这种提问方式暗含了两个假设：其一，这一提问方式无疑预设了文学存在这一前提。“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就是在文学存在这一预设前提基础上，通过寻找一种涵盖所有文学的共同的本质性的内在规定性反过来定义文学本身；其二，“文学是什么”其实就是给文学下定义，而下定义就是从“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中发展出来的。一般而言，定义的方法就

是把被提问的对象联系到这个对象所属的类概念上去，它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即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逻辑方法。“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又无疑假定了文学具有一定的、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的本质，并且这种本质在对文学进行界定之前已经先验地存在了。

“文学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反映了古希腊以来传统的本体论或实在论的思维模式。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他所追问的是事物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柏拉图正是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即“理念”，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本质世界”，他在这里区分了感官接触到的现象与理念构成的本质，本质和现象的区分提供了后世人类观察万事万物的基本概念图式。亚里士多德通过对“是”的研究，揭示出实体与属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并将这种判断方式或者定义方式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传统文学的提问方式基本延续了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而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也决定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即基本局限于古希腊以来哲学视阈中所设定的一些基本问题，其提问方式、问题域以及回答路径也基本限定在形而上学所设定的范围之内。从柏拉图认为艺术是理念摹本的摹本，到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模仿现实的理论，再到黑格尔的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论，以及国内教科书系列中的“文学是现实的反映”说，基本上都是传统形而上学提问方式及回答方式的延续。

文学的提问方式随着哲学提问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古希腊哲学提问的问题是“是什么”，那么，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终于意识到“思维和存在同一”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思维与存在是否同一，人何以能认识对象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在笛卡尔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出发点，确定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但是主体哲学又预先假定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因此，文学研究到了这里就成了一个认识的问题，作为统摄人的主体理性被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文学研究的问题域随之转入了由主、客体

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和提问方式所产生的问题之中，但古希腊以来的基本思维框架并没有根本改变，透过现象追求本质仍是认识的首要任务。

从认识论界定文学本质无非是将文学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从社会本质来揭示文学的本质；或者将文学视为一种美学现象，从美的本质来界定文学的本质；或者将两者结合起来，从社会和美学两个方面界定文学。但无论哪种文学界定方式，都没有摆脱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和问题域，也没有摆脱哲学在涉及此类问题时的回答路径。同时，传统的主体性哲学还是相信语言符号的“镜式”本质，相信意识与客观、形象与客体的直接同一性，认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真实的关系，语言符号完全可以“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本身。这里暗含两个前提：一是客观现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的变化而真实存在，二是相信理性的主体可以通过语言符号接近和掌握客观世界。但是，从笛卡尔以来以主/客二分构建起来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所隐藏的内在矛盾在20世纪暴露无遗，陷入了内在危机之中。绝对化的理性成了新的权威和迷信，理性独断的自白造成了这种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成为脱离现实生活的思辨形而上学体系。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尽管经历了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换，但寻求事物的普遍本质和普遍必然性一直是哲学的终极追求，对文学本质的追问也同样如此，而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也以知识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这些普遍性是从许多个别经验的观察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因此，普遍性是概括的结果，可是，概括又是一种主观的行为，因为概括暗含着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和建构，因为人们在总结归纳时无法涵盖所有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有限的事物，归纳推理出这些事物的普遍性本质，在有限到无限之间就加入了人们的主观想象。因此，在有限与无限之间、主观和客观之间并没有架起一座“必然”的桥梁，以有限得出无限，从主观得出客观，这是传统哲学和文学在对本质追问时所隐含的悖论。

在笛卡尔以后，哲学或文学的本质追问的重任落到了理性/主体的身上，笛卡尔怀疑一切，但“我思”是其预设前提，是不能怀疑的，“我思故我在”

成了笛卡尔进行本质追问的逻辑证明的基本模式。因此，从笛卡尔开始，对本质的追问就从归纳转换为演绎，即从一个预设前提出发进行逻辑的推演，但是其逻辑推演的结果早已包含在其逻辑推演的前提之中：理性不可怀疑，其逻辑结果只是证明了理性的可靠性或不可怀疑性，这样，用演绎推理对本质进行追问就建立在一个预设或假设基础上，但“我思”本身的可靠性又在哪里？因此，不管是归纳还是演绎，其逻辑前提都建立在一种经验的判断基础上，但经验判断所提供的一切并不具有必然的可靠性，因此，其对本质追问的结果也是不可靠的。

索绪尔的语言学让人们知道了在主客体之间的语言符号作为中介物的独立价值，这些语言符号有其独立的编码规则和运行规律，它作为一种深层“结构”先行于每一个话语主体，有效地制约着每一次“言语”行为和表意实践。语言符号不仅作为以一种先行于主体的中介物横亘在主客体之间，并且根据自己的编码规则和运行规律制约着主体对客体的再现和理解。这样，主体认识、把握现实必须经过语言架构，受语言架构的制约，现实也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认定的客观现实，而是语言建构的现实。“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传统哲学，被探索两极融合、过渡和转化的中介哲学——现代哲学——所取代了。这种取代，是迄今为止的最深刻的哲学革命。它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追求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致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即从深层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sup>①</sup> 因此，文学研究到了这里，就变成了文学在语言中是什么？既然人们不能直接接近或者把握本质，必须通过语言这个中介，那么，文学本质的呈现就更扑朔迷离了。

## 二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苏格拉底总结出了关于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

<sup>①</sup> 孙正聿：《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